

# 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 哲学反思

韩爱叶

**【提要】**理性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化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有三种模式，展现了不同的现代性理念。这个探索的过程也是道德理性、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博弈和抉择的过程。三种理性取向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不同定位，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归根结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基于历史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为现代社会理念，找到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正确方向，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关键词】**现代化 理性 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1)04-0040-06

现代化是展开了的、现实化了的现代性，现代性是理念化了的、观念形态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化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理性概念反映了哲学对人的本质的定位，同时也反映了它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sup>①</sup>理性与人同在。本真的人的理性应该是全面的，应是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的统一。现实的理性是具体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理性的出发点，它决定着理性呈现的内容和形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主体对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即对中国现代化具体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和理性的选择过程。

从近现代历史来看，中国对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主要进行了三种尝试。这三种现代化路向分别代表了三种理性取向：道德理性、启蒙理性、历史理性。以“中体西用”为理论基础的

封建旧势力主张以道德理性为旨归的现代化路向；主张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西化派以启蒙理性为旨归；主张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以历史理性为旨归。“中体西用”论者把道德理性作为人的根本，强调人是道德实践的主体；西化派把启蒙理性作为人的根本，强调人是认识活动的主体；马克思主义派把历史理性作为人的根本，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三种理性分别代表了三种思维方式和三种价值追求。道德理性代表了一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原始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这是一种吞噬了人的个性的集体主义。启蒙理性代表了一种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历史理性代表了一种“高级的天人合一”

<sup>①</sup> 陈嘉明：《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研究》2008年第6期。

的思维方式和高级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追求，这种集体主义实现了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的统一。

关于理性，马克思有过如下表述：“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是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sup>①</sup> 马克思认为理性向来就存在，它有不同的形式，不应该像理性主义者那样把理性当成衡量现实的尺度，而应该从社会现实出发来引出不同形式的理性。这里已经蕴含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表达的思想：“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sup>②</sup> 代表中国近代三种现代化路向的道德理性、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分别有其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

## 一、以道德理性为旨归的现代化路向

首先进行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是封建开明官僚，他们企图在整体上保存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进行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这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主张，清末的洋务派就属于这一派。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一小步。但是，作为一种防御性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所取得的进展是很缓慢的。一方面，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当时的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是很肤浅的，还没有形成对现代化的自觉的、透彻的认识；另一方面，当时由旧社会的当权派发起的洋务运动具有很大的反动性，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中国社会本身的现代化，而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这种现代化模式的理论基础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入侵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动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轩然大

波，“东西古今”之争，就是社会变动在思想界的反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封建社会开明官僚妄想在保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提出的口号。“中体西用”作为整个19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思潮，不只是洋务派，当时的各派知识分子，凡是认识到向西学学习的重要性的人，差不多都赞成此论或受到它的影响。一向自恃文化大国的中国民族突然遭遇影响着民族存亡的西方文明，这就使一些识时务的开明之士认识到改变传统文化的需要。“中体西用”论者认为西方文化以物质文明见长，而中国文化以精神文明见长，所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以补中国的物质文明之不足，从而建立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以西方文化为功用的中西合璧的新文化来满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中体西用”论能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但是，它并没有认清社会转型的关键，没有认识到生产方式的转变才是社会转变的枢纽和要害。事实证明，这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进行的现代化的尝试只能以失败告终。

道德理性是封建旧势力现代化路向的理性旨归。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孕育道德理性的历史土壤。旧中国是个以农业为主的大陆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旧中国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这种现象就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反映。农业靠土地，土地是不能移动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模式单一，缺乏流动性和变化性。《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民复接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sup>③</sup> 这既是中国田园生活的一幅缩影，也是生活在小农社会里人的理想社会画卷。在小农经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③ 《老子》第18章。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家族制度是封建主义中国的产物，人们主要靠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三纲五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典范，就是封建宗法社会家族制度的浓缩。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封建统治者采纳，从此儒家思想取得了意识形态中主流派的正统地位。从某种角度来看，儒学就是论证这种家族制度的合理性的理论体系。“内圣外王”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儒学认为道德是人的根本，由“内圣”而“外王”是成就人的道德品格的基本途径，这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致思路径。儒学追求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道德理性是儒家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的封建社会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人们因时而作，一方面表现为人对自然之天的依赖，这是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一方面表现为对义理之天的崇拜，这是儒家义理之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这也是中国原始的前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形成的社会基础。在这个时期人们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主体和客体、自我与对象的区别。在前现代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形成了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体的利益，在旧中国，这种集体主义是消解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原始的集体主义，人的个性被吞噬，更谈不上个性的自由发展。在近代中国面临社会转型之际，由于他们不能完全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进程，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开明人士幻想建立一种以道德理性为旨归的现代性，这就只能成为可悲的留恋旧社会的挽歌。

## 二、以启蒙理性为旨归的 现代化路向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理论基础的洋务运动的失败。这使一些人认为必须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的封

建制度越来越成为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桎梏，成为中国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作为新兴社会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他们不但要求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还要求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维新运动失败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中体西用”割裂体用统一的“体用两概”的理论模式受到批判。严复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中体西用”论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不揣其本而末是求”，这就犹如“牛体马用”一样可笑。<sup>①</sup>“中体西用”理论模式逐渐被打破。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通过维新变法来改变不合时宜的封建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封建统治。现代化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提出“新民”说，要求根本改变国民素质，可以说认识到了现代化的主体因素。新民运动启迪了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毛泽东就是深受新民运动影响的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后来在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很好的思想文化基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让国人痛定思痛，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要根本变革社会，必须进行文化价值层次的彻底革命，才可能实现民族的现代化转型。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清算。胡适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典型代表，也是对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其时，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始暴露出自身的弊病，国人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由肯定变为否定，陷入矛盾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最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就是放弃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启蒙理性是主张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理性旨归。启蒙理性也有其产生的历史土壤。生活于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人，主要以商

<sup>①</sup>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页。

业维持生活。为了发展商业活动，他们重视发展工艺，积极创新。这也是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工业文明发达的重要原因。与农民相比，商人的生活富于变化和流动性，因此，和中国的家族制度不同，城邦是希腊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社会组织没有宗法社会那样的森严等级，这也是西方产生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业活动要经常运用抽象数字，这也是西方形式逻辑比较发达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渊源。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对理念和真理的追求成为贯穿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主题。柏拉图的“理念说”把世界分为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认为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虽然柏拉图把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对立起来，但是，从主要方面说，他和一般的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所探讨的哲学问题都是本体论的问题，还没有把人当成世界的主体，没有在认识论领域讨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sup>15</sup> 15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及自然科学的新进展，人们的思想日益摆脱蒙昧的枷锁，走向理性王国，从而发现了自然和人自身、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笛卡尔是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一个代表，倡导了主客对立思维方式的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以人性反对神性，以理性反对蒙昧，理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助威，为之清除来自封建思想的障碍。理性被理解为本人的本质。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sup>①</sup> 启发人类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摆脱迷信和盲从，这是启蒙理性的初衷，在批判封建宗教，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上起过进步的历史作用。有哲学家把这个理性支配世界的现象称为“一次壮丽的日出”，并把开辟了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提升为理念论哲学。但是理性一旦越出自己的权限，理性就会变为非理性。康德写出著名的三大批判，揭示了理性的界限，并且得出实践理性高于纯粹理性的论断。韦伯认为，目的理性的动力原本是由价值理性提供的，然而目的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价值理性日益萎缩，直至人们忘却了发展科技的原初目的。

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内部矛盾的发展，启蒙理性越来越成为纯粹理性、目的理性的独语，理性的癫狂造成了单向度的人。从发现理性到过度地发展纯粹理性、目的理性而导致理性的片面发展，是启蒙理性的历史本性，这是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属性密切相关的。马克思辩证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启蒙理性，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方向和原则。

### 三、以历史理性为旨归的现代化路向

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实践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人民正确的选择。当民族史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时，每一个世界历史性事件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每个民族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给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重大的影响和反作用。思想文化上的论战往往是经济上和政治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19世纪40年代以来，古今中西的文化论战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论战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文化阵线上的论战反映了国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索和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转变，陷入了矛盾之中。一方面，国人肯定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一方面又否定资本主义文化侵略的性质。于是，为中国固有文化辩护的守旧派认为中国固有文明是拯救欧洲的药方，一些原来倾向资本主义文明的人也转向“东方文明”论，和守旧派合流，认为“东方文明”是全世界的光明路向。胡适、吴稚晖等西化派仍然主张学习资本主义文化，顽固地主张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做出正确的历史抉择，这就

<sup>①</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页。

是向俄国人学习，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和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从物质生产和经济上解释了文化的发展变化。瞿秋白还指出，东方民族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发展东方文化。在任何时期，与历史背道而驰的旧势力都不会轻易地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选择了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与主张走其它现代化道路者的博弈中，捍卫历史的真理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正确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的正确选择。

历史理性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性旨归。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中，发现了基于历史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马克思既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儿和信奉者，又是其批判和叛逆者，也是重建者。作为启蒙运动之子，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儿和信奉者。马克思的成长环境充满了现代思想氛围。他在中学时写的三篇作文反映了启蒙思想、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对他的影响。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在大学期间，在法学研究中，马克思被“应有和现有的对立”所困扰，在对“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的关系的深入探索中，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他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中受到了深刻启示。成为黑格尔理性主义的信奉者之后，马克思一度用理性作为批判一切的标准和武器。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马克思发现理性与现实的矛盾和理性标准在现实面前的无力，逐渐动摇了对黑格尔理念论哲学的信仰，开始试图寻找新的哲学理论作为其解释批判现实的武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力武器，马克思迈出批判黑格尔理念论哲学的第一步。费尔巴哈的新世界观让马克思茅塞顿开：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不是国家决定社会而是社会决定国家。这正是马克思用费尔巴哈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而得出的最初结论。马克思遵循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论的内在逻辑，从宗教异化进展到政治异化，又进一步进展到经济异化。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马克思即将完成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转变。从1844年11月完成《神圣家族》后到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实现了从人本主义历史观向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飞跃。《提纲》的思想在1845年冬~1846年夏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全面的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得到全面论述。马克思彻底清算了与旧哲学的关系，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和阐明社会主义现代性找到了新的哲学基础。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儿，马克思是黑格尔理念论哲学的信奉者，启蒙理性曾经是马克思批判一切社会现实的法则；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怀疑和批判者，马克思用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异化现象，这时候，类本质成为马克思批判一切的尺度。最终，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寻找理性的依据，辩证地批判了价值理性、启蒙理性，指明了以历史理性为旨归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方向。伯曼（Marshall Berman）称《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品”。<sup>①</sup>在《共产党宣言》一书里，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历史作用，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指出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由于自身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必然为社会主义现代性所扬弃。

启蒙思想家把启蒙理性作为批判现实的标准，用理性来衡量现实，是不能真正解决理性和现实的矛盾冲突的。马克思作为启蒙理性的继承者，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是在理性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是社会现实决定理性的内容和形式，而不是相反，应该从现实社会领域寻求产生理性的根据和力量，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中，从思辨哲学中发现理性的根据

<sup>①</sup> 转引自黄瑞祺《马克思论现代性》，（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1页。

和力量。马克思强调的理性不是流于空谈的道德理性，也不是独自道白的启蒙理性，而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理性，历史理性是道德理性和启蒙理性的扬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谓的“历史”不是神造世纪的历史，也不是纯粹逻辑演绎的观念史，而是现实的人及人的对象化的感性活动的历史。充分运用人的历史理性，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我们会发现任何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归根结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决定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

通过对近代中国探索现代化道路实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现代化路向在理性与现实的态度上可以归为两类：其一是把某种理性当成具有普遍性的、真理性的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尺，却把现实的事物当成个别性的现象，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丰富多彩的现实应该力求趋同于某种一成不变的理性。例如，“中体西用”论者对道德理性的态度，“西化派”对启蒙理性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其二是主张人们应当从生活实践出发去解释观念性的东西，认为人们的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实践是人类最根本的实践活动，因此，这种观点认为任何形式的理性都应从具体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它产

生的根源。这两类对理性与现实的态度，归根结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前者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后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基于历史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为现代社会理念，找到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正确方向，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为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人们突破了长期禁锢思想的计划和市场之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三个代表思想明确提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解决了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历史任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坚持了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把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理念进一步具体化。历史表明，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始终坚持把唯物史观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国现代性建构。

本文作者：天津医科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2009届博士  
责任编辑：周勤勤

##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s of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Han Aiye*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ason is a key one in modernity theory, and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s a rational course of a society. There are three modes of the practices of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which indicates different ideas of modernity. The course of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is also a course of game and choice of moral reasons, enlightenment reason and historical reason, as reflects not only different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nkind, but also different thinking ways and value preference. In one word, it reflect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historical conceptions. As it shows by history, tak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the socialist modernity as its idea of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found out the correct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ity and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reason; historical conception.